

中國統一之道

· 曹伯一 ·

（本文係作者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參加由本中心召開的「第七屆中韓學術會議」上發表的論文。——編者）

壹、穩定漸進的政治發展

近代中國的演進，是社會變遷過程的外顯；今後中國問題的解決，同樣可以從這一範疇去思索，政治發展則為其中之重點所在。

社會變遷常是漸進的發展，這樣可以維持穩定而又獲致社會進步。故政治發展所注視的重點之一，即在於增進穩定之能力，此種觀念，來自文化延續的需求。文化不宜出現斷層，故穩定的發展，是有益的方式，否則政治發展的延續性將受挫傷。

在政治發展過程中，當然會有追求的目標，這些目標，也可以用來衡度發展的方向與速度。以下幾個重點，常是政治發展所追求，也是今後中國統一問題重要關鍵所在。

一、自由與權威的調適

自由與權威，是歷史性的長久存在的問題。在傳統政治結構中，權威性統治偏向較為明顯；但在現代化政治的追求中，則求自由的傾向又是顯然趨勢。是則，究竟權威與自由的關係應如何調適，方能為人類求取幸福？這是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向，也是必要課題。

在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出現一些偏頗的見解，以為自由必然與權威相敵對，其政治行為往往出現激情，形成為反對而反對的衝動，這種偏向將使政局難以穩定。也有些人，特別堅持主觀的權威，常以鎮壓為手段，此種取向，將形成政治發展的阻力。

二、建立社會客觀評價準則

建立社會客觀的評價準則，是政治發展的另一重要目標。以全民利益為基礎，用以作為確立準則的依據，更是理想的政治社會所需要，這樣，一個政治秩序纔可能建立。

在開發中地區，許多重要事務都缺乏客觀的評斷標準。尤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血緣的、倫理的社會因素，使得客觀因素更不易建立。

在民主政治具有較久歷史的國家中，若干基本觀念已經樹立，普遍深植人心，這些原則指導人民政治行動，這些被普遍接受的原則也就成為堅強的評價準則。

三、政治參與普遍化

在新興國家中，政治與社會參與，可能只局限在社會菁英之中，羣衆未必具有同等機會。那些掌握社團的菁英，如種族、宗教團體的領導者們，可能會利用多元社會取向原則，利用其羣衆，用以求取私利。在這種發展中社會，多元性的均衡並不容易立即出現，因此政治的推動，將是社會進步的主力。政治如不能成為推動進步的主力，很可能反而成為阻礙進步的阻力。

中山先生「訓政」的構想，是要以政治作為動力，發動社會，培養人民行使四權的能力，使之能夠足以擔負憲政社會的重任，使參與普遍化。

四、提升政治體系合法性

使政治體系建立合法性基礎，這是一國政治穩定的重要關鍵，合法性乃是政治體系的重要凝固力所倚。一般政治體系的維繫，經常出以合法性與武力強制兩途。倘人民普遍地在內心中認同這一統治權力的存在與運作，這一統治就確立了合法地位，在和諧中進行統治權的運作，人民會樂於接受統治。假若政治體系所具有之合法性基礎脆弱，則依賴於武力強制之程度必增強^①。

政府施政處處顧到社會正義與公平，顧到全民生計與福祉，並儘可能防止行政錯誤，這個政府與人民的和諧必然可期，合法性必然無礙。中國長時期處在軍閥割據狀況之下，軍閥割據之涵義，即是一種不具備合法性的統治，依靠武力強制作為統治基礎

註① 德儒 Max Weber 力倡合法性觀念，其目的在使治者與被治者求取和諧一致與整體。參見韋氏所著·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目前中國大陸，仍然欠缺完備制度，民意無由表達，共黨「專政」之本質，即是一種欠缺合法性的統治。

五、塑造多元社會

社會的發展，將自然走向多元，在多元社會中，各種社會力量自然產生競爭，而且相互制衡，這種「成長的制衡」，可以推動社會進步，並保障公共利益。政治發展的目標之一，是設法維持此種多元社會，但要使之調和。

六、法治社會的追求

「法治」的追求，可能是爲人類所共同追求的一個良好政治秩序的基礎。人類必須生活在一個秩序社會之中，然後文明纔有進展可能，社會變遷乃可走上增益民生樂利途徑。

西方人社會秩序的兩個主要基礎，即法律約制與宗教道德規範，這二者皆是以個人爲主體，以個人爲主體的宗教生活與法治精神，合而成爲西方文化中的主要部份。自羅馬以後，法律的精研與宗教的普遍化，二千年來同時進展，形成有「法」有「天」雙重支柱，西方文明中的社會秩序，得到培育。至今，仍然沿著這一途徑，繼續推展，求取全民福祉。

中國傳統社會秩序的基礎，將法制規範與道德約束兩者結合成爲一體，總稱之爲「禮」，透過血緣的倫理結構——家庭、家族；透過以道德爲基礎的教化，形成有「法」有「天」的另一種型態。在家庭與家族之中，個人地位並非突出。家長、族長的性質，是親、是師也是君。將天、地、君、親、師結合成一體，形成中國文化的特色，東方文化中的社會秩序賴以建立，與西方以法庭與教堂爲基礎的秩序型態，有其區別。但是，目前此種社會秩序，顯然遭遇到社會變遷的衝擊。

方今，中國社會結構在逐漸改變，家庭與家族的秩序功能，已不若以往那末顯著；功利觀念與個人本位傾向越益明顯，於是「法治」的要求，日漸爲衆所重視，用來作爲維護今日社會秩序的支柱，這是社會變遷的產物。中華民國最近三十多年在臺灣地區的快速進步，安定的社會秩序是重要因素之一。相對的，民國四十年以前國家總的處境，假如也具有良好社會秩序，不是那麼樣長期軍閥戰亂及外來軍事侵略，我們的建國成就一定可以更爲豐碩。

七、重建中華的方向

以上諸端，並非涵蓋社會變遷整個需求，不過已經標示出若干關鍵性政治架構，也即是解決中國問題主要關鍵所在。

中華民國政府長時期來的政治建設工作，就以上各項作觀察，顯然已經獲致可喜成就。政治發展過程原是緩慢，處身其中，尤易忽略，明白提出觀察標竿後，建設成就乃立即顯現。這些建設成就，將爲以後重建中華提供珍貴經驗。

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大陸，毛澤東長期致力於「改造」，由社會結構到文化層面，強行移植「蘇聯式社會主義」，其結果與全民利益產生嚴重抵觸。鄧小平的局部性調整，為時七年，因為漠視社會變遷的「整體」特性，因為漠視了全民利益「優先」特性，目前已遭遇到社會失調的困擾。如就前所揭幾項政治發展目標作觀察，則中共政權竟是空白一片。

目前中共政權在意識、社會、政治及內部權力結構都出現困難，這些困難已經顯著而且明朗。中共究竟何以會出現此種嚴重困難？其原因實在甚易理解，假若前述六項政治發展目標是現代人類社會普遍潮流，則中共在實質上違背了這一潮流，這種違背，也就是中共目前遭遇困難的根源。以下分別具體列述中共的困難所在。

貳、中共意識彷徨的出路

近年來，中國大陸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存在價值，出現劇烈爭辯。這種爭辯牽涉面至為廣泛，涉及馬克思主義的功能，涉及共產政權的存在依據，也涉及中共內部派系之爭。

本來，一種主義之產生，旨在為人類謀求更幸福生活，故一種主義之是否具有存在價值，當以其為人類所能提供貢獻之程度作為衡度準則。是非標準本甚單純，取捨依據亦極清晰。

中國大陸近年來對於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出現普遍懷疑，基本上即由其功能欠缺而來。在長期實驗中證明馬克思主義對社會本質的觀察、對歷史演變的預測，都與實際發展不符。但是馬克思主義是共黨政權存在的基礎，基於這一需求，中共却又必須編造說詞以維護馬克思主義於不墜，爭辯乃由此產生。

一、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困窘

近時期來馬克思主義價值的爭辯，中共「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在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①以新的要求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②一文^③，導引出近期這場論爭。蘇文目的是反對拘泥於馬克思教條，對於已證明失效的部份要勇於承認，但馬克思主義原則仍要堅持。這種論點，仍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④理論與實際^⑤一文論調的延續，也是政策調整論者的理論依據。

註② 蘇紹智（中共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以新的要求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三版。

繼之，出現了以下主要論爭文章：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日，宋龍祥：〈當代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刊《工人日報》，（即馬丁事件原始文章）。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六日，陳涌：〈文藝學方法論問題〉，刊《紅旗》一九八六年第八號，點名批判劉再復（中共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指責文藝自由化觀點。

四月三十日，蘇雙碧：〈關於展開百家爭鳴中幾個問題〉，刊《光明日報》。

四月卅日，胡啓立：〈當代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刊次日《人民日報》。

五月一日，胡繩：〈關於加強社會科學研究的幾個問題〉，刊《人民日報》。

五月四日，董京泉：〈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在不斷突破創新〉，刊《光明日報》。

五月七日，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歷史回顧〉，刊《光明日報》。

五月八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

五月十一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支持探索鼓勵創新〉。

論爭在繼續中，其中馬丁的主張與批判馬丁，以及劉再復的主張與批判劉再復，代表了雙方論點。蘇紹智、胡啓立、胡繩等，基於職務，他們的文章自然更具代表性。

五月十一日，楊海坤：〈編輯的傾向與學術自由〉，刊《光明日報》。

五月十二日，《光明日報》評論員：〈文藝要堅持正確方向勇於開拓創新〉。

五月十四日，王蒙：〈關於文藝批評要正常健康民主〉，刊《人民日報》。

五月十六日，于光遠：〈雙百方針提出二十周年〉，刊《人民日報》^③。

二、蘇紹智的「誤導」

中共「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於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以新的要求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文，流露出「理論與實際」的嚴重衝突。

蘇紹智尖銳地抨擊了「僵死的教條主義」者，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當作聖經」，他說：

「一種主義要能為羣衆所接受，所信仰，決不是靠『大樹特樹』，而是靠它能解答歷史和現實所提出的問題，解答羣衆所

註③ 列舉各文，均已明記所刊出報刊名稱及日期，備供分別查閱。

提出的疑難，推動現實的發展。」

蘇紹智承認對於主義的價值評斷，必須建立在實證的功能基礎上，但他仍然企圖挽救馬克思主義的存在，他又說：

「過去，特別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當作聖經，甚至荒謬到把毛澤東語錄這本小紅書，作為評斷一切是非的標準，這種僵死的教條主義把馬克思的理論引導到危機。」

蘇紹智沒有從本質上評斷馬克思主義的功能，却把過錯歸之於導引者的誤導。這種論述，明顯地是避重就輕，祇是由導引者承擔過錯，沖淡對於馬克思主義功能不彰的注意。蘇紹智這種手法，本質是意存「誤導」。

三、胡啓立與「新渺茫論」

中共第三梯隊代表人物胡啓立，在紀念「五一」百週年大會上，提出理論工作者要有勇氣衝破馬克思主義已過時的，或者已被實踐證明不完全正確的個別結論，他強調只有這樣才能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胡啓立的具有代表性的言論，顯現了矛盾性，也顯現了對保守派的挑戰性，他說：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堅持，惟對某些被實踐證明已經過時的或已被實踐證明不完全正確的個別結論，要有勇氣衝破。」

「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僵死的教條，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既要反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懷疑、動搖；又要反對思想僵化，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千古不變的教條」④。

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功能，近年來中國大陸一直不斷地在被否定，「白貓黑貓」論，即就是否定「一貓」論；「實踐檢驗真理」論，既否定了毛澤東的長期專制，也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功能。至於普遍出現的「共產主義渺茫論」、「社會主義異化論」，則是更明朗化的否定趨向。

從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及二十一日《人民日報》提出《理論與實踐》評論，到一九八五年九月「黨代會」中要求「加強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共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與作法已漸漸明朗，那是一種矛盾的心態：既要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但又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實踐功能的欠缺。

四、胡繩的禁區論

註④ 胡啓立，勞動節一百周年紀念會致詞，一九八六年四月卅日。

胡繩，現職「社會科學院院長」，在《紅旗》第九期（一九八六年五月）發表文章，要求學術研究「是無禁區」的。他要求不能一有錯誤就「一棍子打死」。他呼籲凡現實需要的，都可以研究；但是胡繩却又提出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應該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行」^⑥。

要拋棄一些，又要保留一些，這就是中共在理論上困窘之處。胡繩、胡啓立等代表性的主旨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堅持」，以表明並非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但又提出：要反對思想僵化，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千古不變的教條。

胡繩與胡啓立等的說詞，都顯現出中共目前在理論層面的矛盾困境。中共必須要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存在，因為這是共產政權的唯一價值依據；但是中共又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功能的欠缺，用以泄民憤，也用以吸引羣衆，強化向心，當然也是藉此以挽救政權的命運。

要解決這種困窘情況並非容易，中共在香港的《大公報》也認為「要做到恰到好處，非有高度的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不可」，這已經指出胡啓立這一派的統一矛盾的苦心，又將會產生一個如何落實的問題。假如不能擁有足夠的智慧，又同時未擁有足夠的理性認同，要以此用作統一矛盾的基礎，中共必將出現一個新的「渺茫論」。

五、突破困境的出路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共黨內派系之爭又在彼此較量、相互角力。中共在香港的《大公報》率直地提出此一看法，《大公報》說：「從另一個角度看，胡啓立這番話也反映出舊的反對改革、堅持保守勢力不只存在，而且明裏暗裏阻擾著改革」。《大公報》附和胡啓立說法，指控「保守勢力」：「他們堅持的『理論』，就是那些教條，那些馬克思著作中已經證明或已經被證明不完全正確的個別結論」^⑦。《大公報》已在正面提出了派系之存在，但却尚未瞭然派系或權力鬭爭究竟根源何在。

馬克思主義長久以來被共產黨人所盲目渲染，但是在長期實證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所能提供的貢獻竟是如此貧乏。在戰後尖銳思想對立中，歐亞地區三個「分裂」國家——中國、韓國、德國，都同時存在兩種社會制度，在兩種制度中人民生活差距形成強烈對比。基本上是意識形態導引了社會制度，三個分裂國家，對不同主義的功能作了最具體說明。

共產黨人在彷徨中究應何去何從？其理甚明，其理亦簡。功能不彰的主義，就應拋棄。從廣大人民需求中去體驗，以人民的

註⑤ 胡繩（中共社會科學院院長），《關於加強社會科學研究的幾個問題》，《紅旗》，一九八六年第九期，五月一日，北平。

註⑥ 施君玉，《理論學術研究不可有禁區》，《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六年五月二日，第三版。

需求作為取捨方向。堅持那種不必要的「堅持」，徒然只是堅持著共黨與人民的對立，對共黨不利，對人民不利，別無其他。

叁、中共經濟調整與社會變遷

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必有其整體性。社會內各因素的互動，由而形成了有機的和諧。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說，強烈地排斥了社會整體的有機觀念。狹隘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盲目地隨聲附和，排斥一切，於是自我孤立於社會通則之外。由於此種自我設限，導致政策錯誤。

中國大陸社會學者們，不久前集會研討「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變遷」^①，這是一個新趨向，這趨向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約束力已不如以往，這也說明理性思考已逐漸抬頭，但是社會學者們的理性思考，對於中共政權究竟能有多大影響呢？參與會議者一百三十二人，承認「社會問題成堆」，但是會議祇討論了以下四個主題：

一、改革引起「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是社會變遷最重要的部份

中共政權以往的經濟理想，是朝向單一的公有制格局。目前則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並結合多種經濟形式。於是馬克思主義者過去那種簡單化地，依所有制關係的階級區分方式，有了顯著窮困。

會議提出二種補救方式：

- 第一、「是否可以按職業、職務、收入和政治地位劃分各種不同階層？」
- 第二、「是否可以認為已形成了小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層？」

二、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協調發展問題

會議認為「經濟改革已經引起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等各方面深刻變化」。社會本身原本是一個有機整體，任何社會都必須保持社會內各因素的協調發展。

會議也認為「過去共產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經常漠視社會發展的整體性，片面追求經濟的成長，忽視文化、教育、衛生、科技、消費生活、環境等各方面的發展，甚至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並不存在社會發展的不協調問題。」於是自然地造成

註① 入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變遷V，社會學討論會紀略，光明日報，一九八六年一月廿九日，第三版。

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嚴重不協調，「於是不僅影響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時也抑制和影響了經濟的發展。」

尤其要重視的是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協調問題，一個經濟發展生機蓬勃的社會，必然有一個政治民主的社會相配合。一個經濟奇蹟的社會，必不是建立在政治沙漠的基礎之上。魏京生「政治現代化」的呼聲，遭受中共政權嚴厲拒斥，但現在他們方始覺察到「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協調」，是如此重要。

三、改革與價值觀念變化問題

中共政權將中共私利放置於中國人公利之上；中共政權又是如此放不開計劃經濟原則，以致經濟長期萎縮。長時期來中共迷信「憶苦思甜、階級教育」方式，以此作為政治社會化途徑，用以傳播中共的價值觀念，唯物主義者依賴唯心主義的手段，維繫價值觀念的存在。

現在他們發現：「單靠憶苦思甜、階級教育不行」，「還要靠知識、榜樣、社會激勵」；也發現：「尤其是青年，他們求知、求實、求樂、求美」；他們又發現：「要從現實出發，承認個人物質利益原則」。

這些「新發現」，其實在自由世界中都已有長時期探討，也有實際作法經驗，成為促使社會進展的主要環結。只是共產社會過度封閉，對外界知識與經驗，有過多排斥，以致現在纔為學界所發現。

四、改革與生活方式變化的關係問題

中國大陸中共控制的社會中，生活方式變化幅度並不太大，但社會總是在變遷中。

他們發現「生活方式要素，至少應包括生活需要、生活習慣、價值觀念及實踐活動等幾方面。探討生活方式，其範圍至少應及於物質消費、職業型態、家庭生活、文化休閒、人際關係以及政治活動等諸面相。」

鄧小平的政策調整、對外接觸增加，不免促使中國大陸社會產生較大變化。明顯的生活方式變化趨向：「從自給型向商品型轉化、從單一化向多樣化轉化、從封閉型向開放型轉化、從物質型向文化型轉化。」

目前變化幅度並非太大，因為追求溫飽目標仍屬主體，飲食支出仍佔生活消費中主要部份；文化生活方面，層次仍低，佔生活費用支出比重仍低。

以上四個主題有其重要性，但是社會變遷並不祇是以上四個主題而已，共黨政權祇是初次發現社會竟是那末整體而且有機。社會中各因素原本有其自然地相互調節功能，構成社會的自然生態，祇是馬克思主義錯誤地過度主觀地以為經濟因素可以單向支配整個社會。

中國大陸研究社會現象者集會發現了社會變遷問題的嚴重性，但是掌權者能否由此獲致同樣瞭解，其間存有鴻溝。共黨政權即使對社會整體變遷特性有所瞭解，又如何突破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論的約束？真是「社會問題成堆」。

肆、中共政治堅持的動搖

在社會變遷原則支配下，中共的堅持政策顯然有其本質上困難。鄧小平構思中經濟的四化與政治的四個原則的堅持，將之合而成為一個社會新型態，名之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這在本質上已經出現失調。社會必然具有整體性，社會不可能在經濟變遷的基礎上求取政治的不變，失調的後果，必然會出現。

陳雲在「八大」會議上，已經提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當時已經隱約地提到「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弊端。以後再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逐漸由經濟領域進入政治領域，強調了問題的嚴重性。但是陳雲並沒有看得到政治與經濟失調所帶來的後果，那將是一個更嚴重的情況。

《光明日報》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初發表評論員文章，提出「改革政治體制，加強政治民主」^⑧，這是一個可注意的動向，中共提出政治的堅持七年以後，魏京生被捕七年以後，中共政權的政治堅持已出現了「堅持」不住的跡象。

《光明日報》指出：當前在民主問題上仍然存在一些模糊認識，主要表现在兩方面：

第一、以為當前「社會主義民主」已經是最完善的民主，不需要再發展了；誰一提民主，就會被認為是否定現在社會是民主的。

第二、認識不足，否認搞四個現代化必須發揚民主。

基於這兩項基本認識，《光明日報》指出當前的缺失：管理體制和制度不夠適應，個別地方甚至連形式上的民主也沒有，民意不能上達，上情也不能下傳。

《光明日報》體會到要從下列「改革政治體制」、「讓人民參與政治、文藝民主」三方面，去理解「社會主義民主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

一、機構臃腫，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家長制、領導幹部以權謀私等，是當前政治體制上的主要弊端，要克服這些弊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改革政治體制，加強社會主義民主，以便同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

註⑧ 《光明日報》評論員，〈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光明日報》，一九八六年六月七日，第一版。

二、讓羣衆參與自己單位乃至整個國家大事的管理和監督，感到自己是名符其實的主人翁，能使人民羣衆自覺的、無保留的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三、在科學界、文藝界貫徹實行社會主義民主，並逐步制度化、法律化，將可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極大發展。
△光明日報▽評論員的觀點，對中共來說無疑具有極大衝擊性。△光明日報▽之所以提出這些論點，在背景上必然受到社會普遍需求的壓力，當然在內部也獲得某種政治力量的支持。

鄧小平掌權後，不得不從事經濟政策局部調整，那是在人民長期忍受低水準生活普遍抱怨的壓力下不得不變，但鄧小平隨即提出了政治的四個堅持；今天中共顯然已經阻止不住廣大人民政治改革的狂熱要求。

社會就是如此依據常規在推進，共產主義者局限在狹隘的思考中，要否定一切常規，於是帶來了無窮困擾。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光明日報▽的評論，是又一個庸人自擾的例證。

魏京生被關在勞改營，在嚴厲的壓力下，精神已經失常，今後大概不可能再聽到魏京生勇敢的為中國前途所高喊的呼聲。魏京生被判刑十五年，是因為他勇敢的提出正義的要求，要求第五化——政治現代化，這個可愛的民權鬥士指出：沒有政治現代化的四化，不可能成功。因此被判重刑，因此遭受嚴重精神虐待。現在，△光明日報▽也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以便同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合」。這樣看來，魏京生究竟是一個先知？或應是一個罪犯？

在共產主義者狹隘的主觀意識下，井蛙之見不知冤殺了多少人，更嚴重的不知道錯定了多少政策，却仍自以為是地不斷地迷惑自己。庸人之可悲，因為自己製造困擾；庸人之可惡，因為為廣大人民帶來了苦難。

伍、孫中山先生的統一國家模型

人類社會常會出現問題，有礙於人類生活內涵提升與生存環境美化。因此產生了思想，由此構塑另一種文化型態，希望能解決問題、排除障礙，追求完美。但「思想」能否解決問題、追求完美，則與思維過程，與實際相結合的程度，具有極大關聯。

孫中山先生考察事物過程中，重視實際。在興中會初創時期（一八九四年），解決當今人類社會三大問題的思想體系已經萌芽。直至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方完成三民主義演講，前後歷時達三十年，這三十年正好與孫先生領導革命的實際行動相配合。因此，中山先生的思想體系經過實際體驗，然後逐漸成熟，不祇是基於深思熟慮，而且涵有實務驗證，因此可行性高。

一種思想的產生，常孕育於某一特定社會背景之中，中國清末民初的社會背景，促使孫中山先生構思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中山先生的思想體系，建立在積極性的解決三個主要問題的基礎上。具體化以後的行動，那就是「國民革命」運動，這是多目標

的救國運動，是「不分階級」的「全民革命」，也是「不分階段」的畢其功於一役的「全面革命」。

一、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的「全民所有國家」

中國必須是「全體中國人」之中國，中國必須是具有「中國文化」內涵之中國，這是中山先生解決中國問題的第一個重點^⑨。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時，已將民族主義提升到文化層次，主張要重視固有道德、固有智能，在「固有文化」基礎上，發揮民族精神，此時顯然已經將民族主義涵義超越了以血緣為範圍的民族意義。

在血緣的與文化的基礎上，民有的涵義基本上是指「國家為全體人民所有」。國家既為全體人民所組成，國家自應為全體人民所共有，故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具有「全民」基礎。中山先生主張中國乃是全體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乃是具有中國文化內涵的中國。

如果將「人民」一辭予以階級性限制，這必然破壞了全民利益。民族意識是「全民」性的，階級意識是部份性的。民族意識是以整體包涵所有個體，自然需要「互助合作」；階級意識以一部份對抗另一部份，自然產生「分化鬭爭」。共產主義者反對民族主義，但是却常常利用民族主義。中共對香港人責以「民族大義」，要求回歸，要求認同，但中共並沒有說中共基本上具有背離中國文化的特質。這就是共產主義者常在手段上利用民族主義，但是在本質上却是反對民族主義。

中山先生「全體中國人所有」與「中國文化根基」立論基礎上的民族主義，又包涵了一些具體化主張，如恢復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地位等各種方案。

二、以全民參與為程序的「全民所治」國家

中國必須建立在「全民參與」基礎上，是一個全民民權的中國，這是中山先生解決中國問題的第二個重要主張^⑩。中國傳統理念中原已擁有崇高的「民本思想」，且歷史久遠。但中國歷史性遺憾，是缺乏健全的「全民民權制度」。民本思想涵蓋了「民有」觀念與「民享」理想，但需要「民治」制度為之支持，然後可以具體化，可以落實。

中山先生在同盟會時期（一九〇六年），即已揭出「合衆政府」理想。民國元（一九一二）年臨時約法中，具體提出「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民國十三年民權主義演講，再申明政府屬於全民之主張。中山先生是以全民參與過程建立全民政權

註⑨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部分。

註⑩ 同前書，民權主義部分。

制度，不僅彌補了中國的歷史性缺憾使民本思想得以落實；也調和了世界性的自由與秩序的衝突，調和了個體與集體的衝突。強調集權者，必同時也強調秩序，顯然偏於一端，「階級專政」之說，成爲集權主義的主要標徵。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由與秩序、個體與集體，常相互激盪、互有消長，人類爲追求均衡所作的努力，史蹟明顯。中山先生的「全民民權」觀念，則爲歷史導入可貴的主流。

以「全民參與」爲基礎的民權主義，又具體地提出保障自由、保障平等各種主張，建立中央與地方均權、權能區分、地方自治、五權體制等各種制度構想。

三、以全民共享為目標的「全民所享」國家

中國的國家建設成果，必須爲「全民」所共享，這是中山先生思想體系中解決中國問題的第三個重要主張^①。使全民皆能「共享」國家建設成果，這是中山先生解決人類現存問題的另一目標，這也是具有終極性意義的目標。這不祇是經濟性意義，而且是整體性社會目標。

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中，充滿了積極性意願。他主張應以人民「消費」需要爲中心來考慮人類的經濟性活動。在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人民可以擁有私有財產，藉私有制度以激發旺盛生產力，但私有財產應有適度節制，避免財富集中，避免財富懸殊。發展生產以求富，合理分配以求均，而形成均富社會。

均富社會的主要形成因素，有賴於全民民權制度的配合，與消費中心觀念的建立。以消費爲民生重心，將生產與分配結合起來，成爲一個完整考慮。有全民民權制度爲基礎，纔可使政策符合全民利益，使國家建設成果爲全民所共享。

自由社會致力於透過政治程序，將資源效用儘可能分配在社會安全和全民福利體系中，使人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提高到可能程度，而絕不是將生活壓縮到最低水準。共產主義者不放棄「集產制」，將使人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都受到扼制。也許人類尚不能克服資源有限的困難，但自由社會的公平公開教育機會，可以充分發揮智慧，向克服困難邁進。

基於「全民共享」觀念爲基礎的民生主義，在制度層次提出具體主張，諸如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節制私人資本、解決衣食住行問題等。

四、人類共同的方向——大同社會

註① 同前書，民生主義部分。

人類社會的發展，將是走向一個兼顧個人、社會，也是綜合經濟、政治等的複合性制度。這制度是將個人自由、社會福利、經濟安全等目標與標準，透過全民民權程序作決定的制度。

這一制度，又是一個由民主政治程序、公共輿論、各種私人社團權益，以及個別公民和消費者所決定的、為「全體人民」利益「服務」的制度。透過這一制度，最終求取全體人民得以共享國家建設成果。

從過去社羣活動經驗，推斷未來社會發展，多種因素必然無可避免地將會綜和在一起。思想、制度等，也必須擴長補短，執兩用中，構思出一個接近完美的途徑，為人類求取幸福。唯物或者唯心，資本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這種一元論的傳統性對立爭辯，這種狹隘的極端性觀念，顯然難以找出人類何去何從的出路。

社會福利的構想與發展，是逐步演進的，不論觀念或制度皆是如此。由部份勞工到全體國民；由消極性安全保障到積極性生活改進；由臨時性緊急措施到永久制度的建立，都是透過不斷的演進而逐步成型。人類的過去，並非先驗性的塑造；人類的將來，仍然將會繼續不斷發展。思想與制度，原是初創於某一特定社會背景，但却成熟於社會不斷變遷過程之中。

「不能期望馬克思、列寧當年的著作，來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中共《人民日報》所提出的這一觀念^②，是中共政權三十多年強行移植馬列主義的體驗。這一體驗是以十億中國人三十年時光付出鉅大代價，所換來的「高學費」的經驗。

五、國民革命運動與國家統一

孫中山先生在理論上創三民主義，在實踐上推展「國民革命」運動，這是先生對近代中國的最主要兩項貢獻。

「國民革命」的傑出性涵義：第一是「不分階級」的全民革命；第二是「不分階段」的全民革命，這是孫中山先生求取全民和諧的一貫主張。

馬克思主義者不斷地提出「階段革命」理論，並將「階級」觀念注入其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兩階段革命論，帶來社會的分化與對立，紛擾無比。

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運動，凝聚了各類型中國人共同參與其中，無分彼此。孫先生革命又是多目標一體進行的運動，將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同時解決，畢其功於一役，無先後階段之分。

「國民革命」是「全體國民」的一致革命，所以，建立統一的中國、建立合理的制度、求取全民的福祉，成為國民革命的重要內涵。孫先生一生為此目標而努力，在臨終時猶殷殷囑咐國人：「革命尚未成功」。先生所指未完成之「革命」，其概念必須

註② 《人民日報》評論員，《理論與實際》，《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第一版。

由「國民革命」之意義，乃可以明釋。

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論

一個政治體系的存在和賡續，主要是來自人民所給予的支持，此種觀念日益普遍，此種政治事實也在日益發展中。所謂支持，是指信任、尊敬、擁護和愛戴。人民對於政府的支持常有二種型態，一種是特定的，常針對某特定事件或政見而給予支持，個別競選者常爭取此種支持。另一種是廣泛性的支持，人民對國家的熱愛，即類似此種心理。各個政治體系都無法滿足公民所有的需求，有時不免遭受橫逆，這時必有賴於國民對政治體系具有廣泛支持，方能安渡危機，政治體系方能安然於有驚無險之中。此種支持常來自理性的對政治社會制度的贊同，或對長時期來奉獻成果的肯定，或對歷史文化的認同。此類廣泛性支持之出現，有賴長期投入心力，有恒的培育，乃可以根深而蒂固¹³。

一、全民幸福基礎

毫無疑義，毛澤東、鄧小平對於「統一」工作着力皆深，但細析毛、鄧所要的「統一」，與廣大中國人民所追尋的「統一」並非一致。

「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數風流人物，且看今朝」。強烈個人英雄色彩如此熾烈，要循「血洗臺灣」、「武力解放」途徑，「統一」中國，這是當年毛澤東個人英雄主義的構想。

透過「通商、通航、通郵」，透過「經濟、文化、科技、體育」交流，用以突破臺灣海峽，求取「合併」，這是鄧小平口號轉於柔和，希望由此求取實效的一種新的設計。

其實兩者方式不一，性質相同。毛、鄧「統一」之道陷入同一範式之中，他們以「地理的合併」與「政權的一元化」用來表示「統一」的成功，這是中國歷史反復出現的分合型態，這也是簡單化的統一構思；他們都沒有從根本上為全體中國人建立健全合理制度這一關鍵問題去思考，這樣就無可避免地將又陷入歷史分合的殘酷循環之中。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新朝代的出現，都是地理的合併，也是政權的一元化，但忽略了從制度上深思，新王朝沒有從「全民」幸

註⑬ David Easton 教授創導體系理論甚力，有助於對實際政治的解釋，參見艾氏所著·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5)。

福基礎上求取「永恒的統一」，因此中國歷史上出現了那麼多「合久必分」。今日中國針對思想的對立、制度的差距，如若仍然單純的以「合併」為統一之道，中國問題顯然並未解決，很難跳出「合久必分」的循環，中國人所共同奮力追求的「永恒統一」也就無從出現。

其實，毛、鄧可能也瞭解此義，但在個人「名垂青史」慾望支配下，希望以有生之年，完成此項「大業」，理性思考也就難以出現。

中共致力統一，多顯示在「權術」運作方面，言不及理；中國國民黨對中國統一的具體構想，提出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方案，在理念境上有所落實。

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方案的提出

中國國民黨於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年）三月舉行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中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決議案，號召海內外全體中國人共同努力。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成為統一中國建設新中國的理念內涵^⑭。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意願，是要求這個統一的中國，在內涵上必須是真正獨立之中國，是真正民主、是真正平等、是真正自由、是真正均富、是真正開放、是真正和平之中國。

方案所主張之最主要原則，是要求取：國家、政治、經濟的自由平等。由此原則衍生為三個綱領：

本諸倫理，求國家的自由平等，反對侵略擴張。

本諸民主，求政治的自由平等，反對極權專政。

本諸科學，求經濟的自由平等，反對集體控制。

方案的具體目標，將三民主義在臺灣基地實踐的制度與成果，光大於中國大陸，重建自由化、民主化、中國化統一的中國，為十億中國人所共享。

三、方案的意境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方案，列出具體建國理想，作為全體中國人奮鬥目標，也是對中國大陸十億同胞的理性號召，要點如下：
建設自由、民主、均富統一的新中國。

註⑭ 中國國民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央日報》，民國七十年四月二日，臺北，第二版。

實行民主憲政，確保人民依憲法所應享有的權利與自由。

復興中華文化，恢復倫理道德，維護家庭制度，建立和諧社會。

廢除爲人民所厭棄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四項基本原則」。

廢除顛覆鄰邦、赤化世界的企圖與行動，以仁愛代仇恨、以互助代鬭爭、以自由代極權、以民主代專政。

廢除「人民公社」，實施耕者有其田，厲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保障人民私有財產，使生產成果爲生產者所充分享有。

廢除一切壓榨勞工的制度，維護勞工權益，提高勞工待遇，改善勞工生活。健全現代生產體系，提高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建立以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爲優先的生產次序。增加國民所得，澈底消除貧窮落後。

廢除一切壟斷經濟的控制與配給制度。恢復自由市場，發揮自由企業精神，實施有計劃的自由經濟制度。保障人民經營企業，及選擇職業之自由。

廢除下放勞動及以政治爲升學條件的一切以共黨利益爲中心之制度。保障青年升學、就業、婚姻之自由。

尊重知識份子人格尊嚴及學術研究之自由，並獎勵創造發明。

推行社會福利措施，取消特權利益，達成均富目標。

依據「實業計劃」的精神與方針，以及三民主義在復興基地實踐經驗，與國際資本技術合作，共同開發，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促進世界人類正義、和平福祉。

以上要點，是以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理論爲依據，同時結合三十年臺灣地區建設經驗，並針對了目前中國大陸實施共產制度的缺失，提出有效可行的構思。

四、「臺灣經驗」導引功能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三十多年來，積極從事國家建設，由於人民的勤勞努力與政策的有效導向，人民生活改善甚多。另外一個因素就是面臨來自中國大陸方面中共的威脅，所以大家在這裏更加倍努力，苦幹奮鬥。三十年前，在臺灣每人每年平均生產毛額不到一百美元，現在已超過三千美元。

社會主義者常常批評自由經濟國家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中華民國在臺灣三十餘年對這點特加注意；一方面要注意經濟快速成長，另一方面也特別注意平衡並減少貧富差距。在三十年以前，那時候最高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收入，比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收入，幾乎高出十五倍；三十多年努力，不僅社會進步，而且最高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收入，比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收

入，不過高出四倍。這表示在力求經濟快速成長，提高每人收入以外，同時也力求貧富差距的縮短。

提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有如下具體依據：

第一、在廣州時期，李大釗、陳獨秀領導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服膺總理，為國民革命而努力。

第二、在中日戰爭初，民國二十六（一九三七）年，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於九月二十二日公開聲明他們擁護三民主義。他們認為三民主義對我們國家最適合；而後來他們却推翻了自已原來的諾言。

第三、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來在中國大陸經濟失敗，近年來採取若干措施，朝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方向走。過去他們依據共產黨人經驗，主張重工業優先，現在發現錯了，所以也開始講求農業第一、輕工業其次、重工業最後的政策。

第四、就是重視出口。臺灣地區成功的建立了加工出口區，他們現在也在廣東、福建各地建立經濟特區；而且也開始求取僑外投資。

第五、農業方面，他們現在慢慢地在實質上局部改變人民公社集體化生產制度。

這些都表示，中共在經濟方面，以及九年國教等，已經朝着中華民國建設經驗方向走。但是在政治方面，中共還是高唱馬列主義。實則，在政治方面若不放棄馬列主義，經濟方面也不易成功。

柒、合理制度的理念

一種行為常受價值觀念所支配，鴉片戰爭以後一世紀多時間，中國人究竟在企求些什麼？中國人又在維護些什麼？

一、社會發展目標

社會學家相信，社會必須要有穩定和有秩序，纔能繼續存在、繼續延續；但社會也必須要有變遷才能適應新的需求。因此，社會秩序與社會變遷一直是社會學者重視的二個主要課題，也是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兩個主要層面。

社會變遷過程是錯綜複雜的，並不是由某一單獨因素可以造成，而是許多相互關聯的因素所造成。「工藝技術」因素在人類歷史中具有重要影響作用，如火的取用、火藥（八五〇年）、蒸氣（一七六五年），乃至近代的電子計算機（一九四六年），都為人類歷史帶來極大變動，法勃教授（Peter Farb）對此曾有系統性說明^⑤。經濟決定論者，也強調了經濟因素在人類社會中具

註⑤ Peter Farb, *Humanki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有基礎性功能，馬克思即作此論調。實則「工藝技術」或「經濟因素」，都曾經影響了人類，但都祇是「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德儒韋伯（Max Weber）的理論，說明經濟因素並不一定像馬克思所堅稱的是社會結構的主宰和社會變遷的主要原動力，思想意識乃至於宗教思想都可以影響經濟結構，進而改變社會結構^⑮。

一個社會的發展目標，應包含三個層次。首要當然是謀求人民物質生活的滿足，衣食溫飽；然後進而求精神生活意境的充實與提升；最終則是使文化精緻化，並使全民能夠公平地共享社會所創造的文明果實。「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儀」之說^⑯，中國古代思想家精要地提出國家建設的目標。

英國社會福利學家馬歇爾（T. H. Marshall）主張，實現福利國家的理想，必須具備三種基本制度，亦即透過此三種制度功能，方能使理想中的目標出現。

第一、自由經濟制度，使人人能享有生產成果；

第二、民主政治制度，使人人能自由表達意志；

第三、社會福利制度，使人人能獲得生活安全保障。

這三種制度相揉合，構成現代民主福利社會基礎。這理論顯著地說明了一個健全的社會，必然是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和諧與適應，馬歇爾的理論，包含了目的與手段兩個層次，以福利國家為目的，以三個制度為途徑，透過制度實現目的。馬歇爾的理論，在孫中山先生所創三民主義思想體系中，大致均已涵蓋，馬歇爾氏目睹近代各國國家建設的進展，因之理論更為具體。

二、政治條件支持經濟發展

中華民國是民主憲政的政體，但是自建國以來一直處在相當特殊的環境之中，面對着一些困擾的舊有積習，也面對着新的外來意識形態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新出現的阻力，困難險阻非其他國家可比。

在臺灣地區三十多年努力經營，中國國民黨在政策上先導了國家建設努力方向，人民獲致物質生活的快速進展，也大幅度提升了人民教育水準，國民所得從民國四十（一九五二）年的不足一百美元，迅速地升高到民國七十四（一九八五）年的三千美元，此種成果為全世界所驚奇，也使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黯然失色。以中產者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中山先生的均富社會理想，初度在中國境內出現。在此種進展趨向中，中國民主憲政擔任了重要促成角色，但在社會相互影響過程中，一個快速進展的中產者社

註⑮ 同註①。

註⑯ 中國古代著名政治家管仲推崇此說，見《管子》。

會自也必然會推動中國民主憲政的再進展。

民生主義所求取的是一方面累積財富一方面平均分配財富。這種社會型態的求取並非易事，因為分配的平均原則，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扼制了生產意願及財富的累積。中共政權過度強調了以平均為目的，因此而造成的後果是人民極端地消極性傾向，迫使鄧小平不得不略作調整；相對地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地區的施政，却締造了一個成功的典型。鄧小平的調整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之窒礙難行，所謂調整，顯然是吸取了相當程度「臺灣經驗」，亦即是局部性向民生主義學步。

一般認為，健全的政府政策與勤奮的人民，是締造中華民國在臺灣地區經濟奇蹟的兩大因素。若此說為真，則政治因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已極為明顯而且重要。易言之，中華民國在臺灣地區經濟發展，乃是獲得充分政治因素的配合後的總體產物。此種經驗又可以說明，中共政權局限性的經濟政策調整，失却政治因素的良好配合，其成就有限，而且必然要走向尋求政治配合途徑，原屬可以預見。

三、政治體制與文化的調適

政治體制乃是整個文化體系的一個環節，故政治體制必然與文化母體休戚不可分。中國人所應建立的政治體制，未必是西方政治制度的抄襲，也不應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移植，蓋兩者皆與中國傳統文化母體格格難合。此所以民國初年「全盤西化論」之荒誕不經，此也所以毛澤東移植俄化制度之必然失敗與鄧小平局限性改革之必然遭遇困難，其基本原因在此。

中國人所要建立的政治體制，是既要符合我國數千年傳統精神，又要能融入西方民主經驗所提供的實踐程序。此種整合，中山先生曾經提出理論架構，蔣中正先生曾排除困難致力推展，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大致即是數十年努力的結果。

東方與西方；儒家傳統與馬克思主義，所涉及之歷史與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主張我們應採取與西方社會或列寧經驗完全相同政治體制，或者完全相同政治發展模式，顯然不切實際。此所以中國大陸採取了列寧式「議行合一」政制後^⑧，目前遭遇到困難，原因顯然。

合理的中國政治模式特徵，在本質上應將傳統道德成份納入國家政治生活之中，同時融合對個人人權的尊重兼調和個人與羣體的關係。平等地尊重個人基本人權，以法治調適自由權利，這樣可以構成和諧。個人不應自認其重要性超越團體利益，這會流於放縱，使社會秩序崩潰。團體利益也不宜過度忽視個人價值的重要功能，這樣也會形成嚴酷社會，使生機全失，造成極度疏離。西方社會曾經出現過的極度放縱，造成自由泛濫後的恐怖社會，最終祇是扼殺了個人自由。共產社會現在正存在着的集體主義

註⑧ 列寧反對三權分立制度，讓三權分立制國會為「清談館」，創「議行合一」制，將立法行政權合而為一，成為共黨政權集權根源之一。

，造成個體被漠視後的疏離，祇能使整體利益失落其基礎。

將個人權益與公共利益，獲致一種健全的平衡，這是中國式民主政治模式的精髓。這符合中國儒家「執兩用中」精神傳統，也符合當前社會變遷的實際需求。此種制度包含了中國傳統中的法治主義內在自反，也溶入了西方經驗法治主義外鑲制約；既融入了西方文化所強調的個人權利，也包容了集體主義所突出的整體利益。「執兩用中」可避免極端化所造成的偏頗後果，進而恢宏了制度對人民的功能性貢獻。

中國統一之道，除了回歸中國文化、回歸人民福祉以外，其他都是徒勞無功，有害無益。

捌、結 論

社會變遷乃屬必然，變遷的方向應與全民福祉的追求相結合。但是「應然之理」，未必即為「已然之途」，歷史上誤導不斷，悲劇不絕，亦即是「應然之理」並未成為「已然之途」，兩者間產生差距，由誤導而產生悲劇。

社會菁英分子擔當着「社會導向」重任，近代中國在孫中山先生思想指引下推展國家建設，其成就是顯著的。海峽兩岸現存的社會差距、人民生活差距，最主要原因即在於「導向」的差別。

一、中國現代化社會的內涵

中國人需要什麼？歷史已提供了明確答案。鴉片戰爭以還，在中西文化激盪下，百餘年來中國人尋求自處之道，其間至少經歷過幾個主要階段：洋務運動追求船堅砲利——以「科學」為重心階段；甲午以後與中會與維新運動追求政治改革——以「民主」為重心階段；「五四」結合科學與民主——形成綜合目標階段；北伐運動開展「民有、民治、民享」更完整的導向，追求倫理、民主與科學，增益並開拓了社會目標意境。

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不單純是「科學」或「民主」，或祇是「科學與民主」的結合；中國人所需要的那是文化融和後的創新型態，兼容科學、民主與倫理文化，是東西文化並育的嶄新文化型態。鄧小平的「四化」，限制在局部性經濟範圍之內，拒絕了政治現代化的建議（民主），排斥了中國傳統文化（倫理），因之，「四化」充其量僅與一百年前的「洋務運動」差堪比擬，這種非整體的改變，當然不能滿足中國人現代化的需求。

人類普遍存有追求生存與生活的本能，人類又普遍同具追求更幸福社會的願望。此種主觀性願望之滿足，必須透過客觀性社會制度，方能期其實現。中國大陸共黨嚴酷控制，移植外來馬列主義，要將中國人塑造成另一文化型態，實際上並未奏功。觀乎

鄧小平之必須倡「中國式社會主義」之說，無異說明三十餘年「俄國式社會主義」的強力推展顯未成功，為中國人所拒斥，迫使鄧小平不得不另闢蹊徑。但鄧小平仍是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基礎上構思一切，「三熱愛」為其中心，因此，「中國式社會主義」仍然無法解決與中國文化的衝突。

二、中華民國政治建設成就

檢視中國現代政治的發展，其過程是緩慢的，其方向是曲折的，其間並出現有中共的嚴重誤導，但中山先生的睿智指引，中華民國政府的奮力建設，仍然為中國人帶來了可喜的成就，也提供了中國將來政治建設的模型。

近代政治理論中所重視的政治發展目標，包涵了思想理念以及實際政治經驗雙重成果，諸如：

- (一) 調適自由與權威；
- (二) 確立社會客觀評價準則；
- (三) 普及政治參與機會；
- (四) 提升政治體系合法性；
- (五) 塑造多元化社會；
- (六) 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社會秩序。

這些原則，曾是十八世紀以來人類所共同求取的政治目標，在二十世紀中都已逐步實現。

三民主義所導引的建設方向，正與這一思潮相合，中華民國的三十多年建設努力，也印證了其價值功能，三民主義所求取的政治文化，正與中國人利益相一致。雖然中共政權反其道而行，但從長遠處來看，中共並擋不住這一自然趨向。近年來中共在意識方面的困擾與矛盾，正就是一種擋不住的跡象。

三、歷史終必回歸主流

宇宙間自然地存在着運行規律。自然生態的和諧與平衡，歷億萬年而依然生氣盎然，顯示出自然規律在相輔相成的互動過程中，發揮出平衡與和諧宏偉功能。

人類自然有其需求，求取「生活品質提升」，求取「生存環境美化」，這是人類共同具有的通性。英儒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稱：「即使暴君亦須睡眠」，也印證了此種通性的存在。

一個社會的領導者或領導團體，必須使社會成員自覺地出於道德上的義務感，油然而生尊從意向，這個領導權威纔可能鞏固

，然後形成權力的合理化。由此而建立的政治文化，纔能與全民利益相融合，纔能為全民所接受。

從「共產主義者宣言」（一八四八年）以還，以「鬭爭」奪取政權，以「專政」鞏固政權，乃至發展成爲「槍桿子裏出政權」觀念，共產黨人一直偏向於「力」的途徑。忽視「全民」也有思考意識的存在，忽略了「天聽自我民聽」的自然和諧至理。這是一切與全民相對立的作爲的主要根源。共產主義者以政黨利益與職業革命家的特權，與全民相對立。欲以主觀的單一意識涵蓋寰宇，忽略了人類共同的自然需求與個別空間的特殊需求，馬克思主義者自然窮困。

中國終將統一，中國人有智慧作明智抉擇何去何從；兩個社會對比的結果，這是客觀事實的存在。歸向正義、歸向常態，中國人的努力，終將塑造出中國人所需要的政治文化。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曹伯一博士 著

中共與中國之適應與衝突

本書從過去的「抗日問題」；現在的「鄧小平政策」；未來的「中國統一問題」；歸結到「中共與中國的適應及衝突」。全書十七萬字，計二五一頁。實售平裝新臺幣一五〇元；精裝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經銷